



(四) 師生情切

說到師生關係，不少校友都異口同聲地感慨道：「從考入學試那天起，我已被接待同學的熱情所溶化了，恨不得立即成為中華的一分子。」學生親如兄弟姊妹，老師親如父母，課餘彼此的關係如同大家庭，不論是未來前途的抉擇、文化學習的難題、家裡交不起學費膳費，甚至手臂被燙傷了……事無大小，老師們都觀察入微，並及時盡力設法解決，遂使同學們由衷地感到學校是可依附、可信賴、最安全及溫暖的學習與成長樂園。而校長芬先生則被推崇是愛生的典範，經他的努力，在戰後蕭條環境下，不少家境貧窮的學子奇蹟般地完成了中學課程，後來成為國家與社會的專才。值得濃濃地添上一筆的是，芬先生對校友們的後代同樣關懷，把愛生之情延續到下一代去。

愛生情重 福澤兩代

——記黃祖芬校長的忘年關懷

戰前校友 馮祝庸

那是上世紀的 30 年代，父親在港島半山堅道經營生果店——南方老鋪，我就在附近的教會學校讀小學，到升讀小三時，經友人介紹，轉學到中華中學插班。父親告訴我，想入讀中華中學是很不容易的，因為她是半山區寥寥可數的名校之一，在報讀小一時早就額滿見遺，真是一位難求，不但要有人介紹，還要經過入學試。

祖芬老師面試取錄

還記得我在報考小三面試時，剛好由黃祖芬老師負責，結果我順利地轉學到中華，並在 1941 年夏天小學畢業，順利升讀中一。可是好景不常，開學不到 3 個月，日本就發動了太平洋戰爭，12 月 24 日香港淪陷，香港同胞從此經歷 3 年零 8 個月的悲慘歲月。其後，母校轉移到廣西柳州繼續辦學。而我家兩年後也逃難到廣西荔蒲，投靠叔公。柳州距離荔蒲只有 138 公里，但那時日軍已攻入廣西，火燒桂林，兵荒馬亂，我們朝不保夕，我不可能到柳州的母校繼續學業了。



▲ 年近 90 歲的馮祝庸，依然精神奕奕

劫後重逢即聘用

1949年夏天我家搬回香港。我雖然在廣西荔蒲靠領取「獎學米」（成績優異學生，每學期可獲五百斤學米）勉強讀到初中三，但回港後家庭經濟困難，無法讀書，只能到工廠做工。後來得悉母校在羅便臣道123號恢復辦學，我滿懷惦念之情到新校址溜溜，怎料竟碰到了黃校長，且彼此一見如故，並在校長室暢談別後滄桑，當他知道我的近況，就建議我回校工作，我當然求之不得了。1952年春我就回校當總務處職員，負責膳食和合作社的工作。

安排高考補習

為了做好工作，我在工餘進修會計。黃校長知道後，建議我到中業專科學院夜學部進修，並開列了介紹信，使我順利入讀該校。1954年夏天我作為事務員，隨黃校長率領的教育考察團到廣州，參觀「華僑港澳學生補習學校」（廣州暨南大學前身），目睹該校規模宏大，設備完善，師資優良，遂萌生回內地升學的打算。1955年我在中業專科學院會計系畢業之後，和一群同學打算回內地升讀大學。黃祖芬校長非常贊同，並要求我們通過補習才參加高考，他主動承諾邀請中華教師義務為我們進行小組補習。經過一年惡補後，我們愉快地告別了黃祖芬校長，回穗參與高考，最後果然都能考上大學。

為女兒補習英語

德高望重的黃祖芬校長，對職工的下一代也同樣關心。1990年黃校長知道我的女兒丹丹剛從內地來港，在香港中學讀高中。精通英語的黃校長考慮到當時內地一般中學的英語課程和香港的存在一定距離，對將來的升學和就業會有影響，他向我建議：讓丹丹放學後到他家生活住宿，利用晚上的時間補習英語，並要求每晚寫一篇英文作文。我感到不好意思，這會影響校長生活和休息，但黃校長盛意難辭，只好給黃校長增添麻煩了。黃校長不但慷慨地謝絕了我們要給他的任何費用，甚至女兒的零用錢、交通費等都由黃校長包起！由於黃校長不辭勞苦的教導和親切關懷，丹丹終於順利地在香港考上大學，後來到美國進修和工作。

沒有黃祖芬校長嚴格的教導、親切的關懷，無私的幫助與經年累月的援手，就沒有我家幸福的今天！如今雖年近九旬，卻永遠忘不了黃祖芬校長的深恩！

（原載校友會會刊《國光》2014）



▲ 馮祝庸(右一)與友人攝於學校大門口